

中华道德五千年

⑪

宋元时期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之一)

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主编

中国大史出版社

中华道德五千年

<11>

学术顾问:王炳照 阎国华

执行主编: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宋元时期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

（之一）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期 限 表

(京)新登字第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道德五千年/冯克诚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3

ISBN 7-5034-0922-3

I. 中… II. 冯… III. 伦理学-历史-中国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078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通县京华印刷制版厂

装 订:密云渔家台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100 个印张 字数:2000 千字

印 数:1—3000

版 次:1998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 元 (全套 20 本)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

宋元时期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

概 述	(1)
理学道德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9)
理学道德的理论基础	(10)
理学道德及教育目的	(13)
理学的道德与精神境界	(15)
理学的道德修养工夫	(17)
理学道德理论的特色	(20)
理学的人性二元	(23)
理学的人格境界	(39)
理学穷理成德论	(53)
理学知行统一修行论	(69)
范仲淹的“育将才之道”	(81)
李觏的礼刑教育与道德	(85)
胡瑗“明体达用”的修养理论	(90)
孙复、石介排佛重道的理论	(98)
王安石的“养”、“教”、“刑”以成德	(100)
周敦颐的道德理论德育实践	(109)
邵雍的象数学中的道德理论与德育思想	(121)

张载的：“躬行礼教”与“变化气质”	(125)
程颢、程颐的“存天理”与“窒人欲”	(145)
胡宏的“明体达用”	(169)

宋元时期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

概 述*

公元 960 年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两宋时期，在北方先后有辽、西夏、金等政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兴起，相继灭金和南宋，于 1276 年建立统一全国的元朝。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并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是又一次从封建割据到全国统一的时期，也是一次包括德育思想在内的思想文化继续繁荣的时期。

宋王朝建国之初，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对于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宋初各帝均采取“重文”政策，把尊孔崇儒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同时支持佛、道二教，使儒、佛、道三派融合起来，互相补充，相互为用，展开对民众的思想统治和道德教化。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把人才的教育培养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在“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的主张下，德育实施成为培养人才，挽救时弊的根本途径，宋代文治政教之风蔚然形成。南宋时期，偏安王朝重文轻武，文治政教之

风继续衍化。元朝建立后，仍“遵用汉法”。所有这些成为宋元时期德育思想展开的政治背景。

宋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形态——理学（又名道学、宋学）。理学的产生，使宋元德育思想独具特色，构成了显明的理学学风。理学，发端于唐代的韩愈、李翱，其思想渊源则受之于道教和佛教者不少，但主要思想依然是儒家纲纪伦常。北宋时，统治阶级出于加强思想统治、巩固加强中央集权和整顿封建道德秩序的目的，客观上需要一种正统哲学，理学便应运而生。宋初，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开理学之端，逐渐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哲学，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理学思潮到北宋中期达到第一个高潮，当时涌现出一批为后人公认的理学家，主要是程颢、程颐，再加上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被称为北宋五子，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所谓“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源”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根本问题。他们以儒家的六经，特别是《周易》以及孔、孟的《大学》、《中庸》等著作为根据，建立自己的理论，更新恢复儒家权威，以道德性命之说建立人们对封建统治的信念。至南宋时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使得程朱理学成为正统的官方思想。理学内部出现了南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体系与明朝王阳明一起被称为陆王心学派，其根本的政治主张和德育主张是一致的。

在“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反理学的思想，其主要代表有：北宋李觏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南宋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他们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在德育主张上，他们提倡改革传统的德育方式，批判理学空谈心性的德育主张，提倡培养于国家于民

族有用的“有用之才”，把德育实施融进“实事实功”之中。“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是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思想反映，构成了宋元时期思想史斗争的主线。伴随着“理学”内部不同派别之争，宋元时期德育思想呈现诸家异唱的局面。

因此，理学思潮和反理学思潮，构成了宋元德育思想展开的思想文化、哲学背景。

宋元时期，封建经济已经成熟，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工商业都比较发展，商品货币削弱了农民的依附关系，土地兼并促进着农民革命的高涨。在地主阶级方面，门阀士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除了大地主阶级外，中小地主阶级力量日益增强，在政治上逐渐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重要阶层。于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大地主与封建王朝之间也有尖锐的矛盾。

宋元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四大发明进一步推广利用。沈括、苏颂、秦九韶、郭守敬等在天文历算及数学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宋元时期文化艺术也长足发展。宋代散文、宋词、元曲等都有极高的成就。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与唐代韩愈、柳宗元一起，号称“唐宋八大家”。宋代的词发展到极盛的地步，出现了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岳飞、陆游等著名词人。在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代表了元曲创作的最高成就。宋元文化艺术的成就，一方面成为宋元重视文治教化之风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又在“文以载道”的主张下辅助了道德教化。

宋元时期，社会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期间，当外族入侵、民族危难的时候，民族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

以上，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矛盾等方面的简况，构成了宋元德育思想展开的社会文化背景。

宋元时期，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概述如下：

其一，理学人性二元论构成了宋元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宋元时期，理学家提出了“天命性理”等范畴，把天理与人性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把天道与人道纳入一个更为精致的思辨系统，又把理与气的关系贯穿于对人性的分析，提出了“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道心与人心的“人性二元论”观点。天地之性是普遍的永恒的至善的“天理”（道德伦常），气质之性是个性的后天的被外形蒙蔽的“人欲”。德育的任务，便是使人变化气质，存养省察，让天理战胜人欲，让道心统治人心，种种德育主张和德育实践便从此展开。宋元时期，除理学人性二元论外，还有王安石的性情论、事功学派的自然天赋人性论等等，作为宋元思想领域争端的一个标志而存在着。

其二，以“礼乐刑政”为主要内容的“礼教”，成为宋元德育思想中的政治思想。

宋元时期，中国封建国家在五代离乱之后再度统一，无论是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还是元统治者的“遵用汉法”政策，都将文治教化问题列为封建统治所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宋元德育思想更加关心自己的治政理想和治政方针。封建政治思想即礼政观的教育，成为德育思想家们的热门话题，尽管宋元时期政治集团明显分化，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异常激烈，但各派都认准了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社会

和道德规范——“礼”及“礼”为统帅的“礼乐刑政”诸内容，来展开治政理想教育。无论是李觏、王安石的“礼乐刑政”说，还是张载的“知礼成性”说，或者是周敦颐、二程、朱熹的“礼先乐后”、“顺理安分”说，都体现了宋元时期德育治政理想上注重“礼教”的特点。

其三，宋元德育思想把人才培养的“德才兼备”的原则提到重要议题上。

封建德育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是培养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和接班人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的问题，是德育思想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宋元时期的德育思想中，代表不同政治利益的思想派别，都提出各自的人才培养的德育原则和理想人格的成才要求。司马光以其“才德”之辩，把“德”放在理想人格的首位，把德育标准放在人才考评的第一位。王安石站在推行封建变革的立场上，把“有用之才”的原则与德育标准结合起来考察理想的人才。理学家们高谈心性命理，强调“求为圣人”、“学为圣人”、“立心做人”，此外，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也提出了“学为成人”的人才培养原则。总之，出于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宋元德育思想落实到了关于人才的德育任务上。德育着眼于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着眼于德育的实施，大处着眼，便形成了宋元德育思想中强调“德才兼备”的理论格局。

其四，宋元德育思想中关于个人自身修养的中心内容是“穷理说”。

宋元时期，德育思想家们特别是理学家们，倡导封建“礼教”，把理学体系贯穿于德育思想中，提倡“圣贤”、“君子”的理想人格，提出了以“穷理”为中心内容的修养主张。二程、朱熹提出了“敬义夹持”、“格物致知”、“居敬”、“穷

理”说；张载等人提出了“变化气质”、“集义养气”的主张；陆九渊提出了“切己自反”、“自存本心”的修养主张。另外，从李觏、王安石到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反理学思潮，提出了“利欲可言”、“功成即德”的修养主张。以“穷理”为中心内容的修养说，造就了宋元时代“穷理尽性”的修身学养风气，形成了一代士人关注心性修养的成才品格，一方面使学养走向空泛宽疏，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使人们更注重关怀自身的道德情操、内在涵养、精神境界、品节志气。

其五，宋元时期书院和蒙学的德育实施，有效地丰富了宋元德育方法论。

宋元时期，尽管注重“文教”、大办官学、倡导全面实施德育教化，但国家离乱、战争频繁、国力衰竭的情势，不能不使官学萧条。再加上科举的腐朽，官学教育构成了对人才的扼杀，致使许多士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寻求一种自由的求学修养场所，各聚一方，聚徒讲学。因此，包括书院、童蒙学校在内的地方私学成为宋代官学的有益补充，其德育主张也是宋元德育思想中一笔独具特色的财富。

我们先看书院：在宋初官学尚未全面复兴之际，书院这种新兴私学的发展，对地方民间的德育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名流贤人兴建书院，聚众讲学，客观上促进了宋代重文之风的普及，也起到醇化民风的作用。其教养之规的制定和对礼教民风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德育思想所不及的。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言：书院的“教养之规，往往胜过州县之学”。宋初以降，中央和地方官学得到发展，读书士子热衷于通过官学仕进，书院一度衰落。到了南宋，书院的德育作用又一次得以发展。南宋书院的兴盛与理学家的讲学活动有密切关系，由此，理学的德育主张得以广

为流布，书院的育人宗旨与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理学宗旨合流，既实现了官方思想对民间德育的渗透、普及，又促成了理学德育思想在民间的扎根。

书院德育的内容，基本上以传统的道德规范，配以洞主贤名的德育主张，形成一定的地方特色。书院德育实施的方法主要是“读书明理”，德育实施的主张体现在书院所订“学规”、“教约”中，最著名的当数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除书院外，宋元时期蒙学德育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官方德育的补充。蒙学亦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或是由宗族设立的义学，或富有之家的家塾等。作为一种私学设置，蒙学以教养童蒙、传授识字的基本知识为主，在德育实施方法上，从“洒扫应对”着手，把封建道德理念融于童蒙的感性生活中，在日常小节中培养良好的品德、习性，有效体现理学家“养正于蒙”的主张。

“养正于蒙”的德育主张中，蒙学除了“洒扫应对”、生活礼仪的感性教育外，还强调“读书明理”，恪遵朱熹“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主张，编写了一批童蒙读书教材，如朱熹著《小学》，吕本中著《童蒙训》，吕祖谦著《少仪外传》，程端蒙著《性理字训》等。元初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了读书的次第方法。除此之外，蒙养教育还主张因势利导，配以歌舞、吟诗、讲述故事等形式，以“乐教”辅助德育实施。

在德育实施方法上，佛教禅林的“触类见道”的修养方法也对世俗德育实施有一定的影响。宋元时代，作为理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尊德性”“道问学”之争，实质上是宋元德育实施方法的理论检阅。

从以上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德育思想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上呈现如下特色：第一，宋元德育思想具有明显的理学学风；第二，个人修养主张上，强调心性修养功夫、穷理尽性成为修养论的中心内容；第三，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实施德育的“礼教”风气；第四，宋元综合德育风貌蔚为壮观，官方理学德育、功利学派的反理学主张、书院教育、蒙养教育以及佛教、道教的教养方法等，从各个层面，以各种形式构成了宋元综合德育的风貌；第五，德育改革思想不断出现。随着宋元时期几次兴学运动和政治变法运动，德育改革思想不断完善。范仲淹、王安石、胡瑗等人的教育改革思想，给宋元德育实施提供了新思路。

宋元德育思想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上发生过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理学德育思想，远承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近承唐代韩愈、李翱复兴儒学的初衷，以复兴儒学为使命，揉合佛道修养论，把儒家德育思想发展到最高阶段。宋元以后的正统德育思想，都贯穿着理学德育观这一主线。作为反理学斗争和宋元时代社会变革产物的反理学德育思潮，即以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主线的功利主义德育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变革思想的代表，并影响着后世的德育变革。

理学家提出的“读书明理”、“穷理灭欲”、“求为圣贤”、“居敬集义”一系列德育主张，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封建社会后期纲常伦理的教化对人民的思想统治，造成了封建德育对人才培养的偏差；另一方面，理学德育思想又启发人们培养崇高的精神境界、品格气节，增强历史使命感、道德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感，努力“志道依仁”、“立志”“养气”，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留下光辉印记的士人精神。同时，宋元

时期的反理学思想及德育变革思想，又肇端了封建社会后期德育变革和反封建正统德育的进步思潮。

理学道德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宋元明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较后时期。

公元 907 年，唐亡。此后的五十四年，处于五代十国割据的动乱年代。公元 960—1127 年为北宋。宋王朝统治者加强了君主中央集权，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与北宋并存的，东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公元 1127—1279 年为南宋。此时金人取代了辽，统治着北中国，宋王朝由汴京（开封）迁都临安（杭州），偏安于南方，形成宋金对峙的局面。公元 1271 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共九十八年。公元 1368—1644 年为明代。明王朝至神宗万历（公元 1573—1620 年）年间，由于封建制度的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包括德育思想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产生了与明初极不相同的情况。因此本章所讲的宋元明时期，下限至明万历之前。明万历年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将另作一时期加以描述。

纵观宋元明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充分发展，土地的兼并集中，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而复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面前，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日渐加剧。这些矛盾和斗争给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这就是如何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问题，因而在学术领域一度出现了比较活

跃的局面，形成了诸多学派。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以范仲淹、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二程（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等等。各学派在政治上一致要求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学术上则有分歧。这一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各学派的德育思想观点及其体系之中。

一般说来，各学派都十分重视人才对政治的作用，有的思想家把培养人才视为变法革新的先决条件。各学派都反对国家注重科举而忽视学校教育的倾向，要求整顿、改革中央官学，发展地方学校，培养人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在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各个学派的想法都不完全一样。范、王二人及陈亮、叶适等主张德才并重。他们强调人才的封建德行修养，同时又重视各种实际的治国、理财、将兵才能的训练，要求文武兼备，经史律令兼知，以达到加强各级封建统治的目的。理学家、心学家则片面强调人才的封建纲常名教的道德素养，轻视各种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如军事、律令、农艺等知识技艺。二程、朱熹提出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明天理、灭人欲”；把道德教育的过程看作是“明天理，灭人欲”的过程。

理学道德的理论基础

宋明理学，无论是它的奠基时期、成熟时期，还是崩溃时期，无论是“气”一元论者、“理”一元论者，还是“心”一元论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头总是要大讲一通理、气、无极、太极之类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宇宙论，然而他们的宇宙论是为重建孔孟之道服务的。他们从宇宙论出发，进而

论证封建教育，是通过“人性论”为中介的。理学“人性论”是联络、沟通理学宇宙论与教育论的桥梁。

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出一源，都是同一材料——“气”构成的。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他把人与天地同体共性的本然之性叫做“天地之性”。这是人所共有的、至善的，是宇宙普遍必然的永恒秩序和规律在人性上的体现。然而，每个具体的人，有了生命之后，就具有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和他的生理条件、身体特点紧密联系的，他把这种具体的每个人的本性叫做“气质之性”，这是各人不同的、后天的、有善与不善的。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管辖、支配“气质之性”的，而“天地之性”又需依赖“气质之性”才可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也就落了空。但由于“气质”的偏蔽，可能障碍“天地之性”的正常发展，所以张载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去掉偏蔽，使“气质之性”完全受到“天地之性”的主宰、支配，这样就可以“顺性命之理”，防止“灭理穷欲”了。

朱熹完全接受了张载的这些思想，还继承了程颐的“性即理”的思想。他把张载的“天地之性”改为“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认为“天命之性”即是“理”，是封建道德的必然要求和规范。但由于“天命之性”常受形气的私情所蒙蔽，微妙而难显现；“气质之性”来自人的形体，对外界的反应常产生过与不及的偏向，不容易适得其中，故危殆而不安。所以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发挥“气质之性”中那一部分先验的“善性”，按照“仁义礼智”四德去做，才能“变化气质”，改变“气质之性”中那“不善”的部分，使危殆的“气质之性”由危转安，微妙的“天命之性”由隐而显，从而使

“天命之性”得到完整的充分的表現。

理学“人性论”的重点在于论证先秦儒学提出的封建道德规范是“天命之性”，来自“天理”。人见小孩坠井去救援，不是为了要功图誉，而是“应当”必须如此去做，人人都应自觉服从“天理”，人人都不可以违反“天理”。只不过由于气质的偏蔽，使得有些人没有能很好地把这个“天命之性”充分体现出来而已。

经过理学的论证，先秦儒学提出的“性善论”与“性恶论”得到了新的综合解释。理学认为：孟子主张性善，是指“天命之性”，但孟子不知道人还有“气质之性”，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人性既善而恶从何来的问题；荀子主张性恶，是指“气质之性”，但荀子不知道人极本穷源的“天命之性”是浑然至善的。所以孟荀对人性的解释都不圆满。理学“人性论”，一方面吸收了荀子“性恶论”对人改造的观点，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从理论上论证了人人接受封建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发挥了孟子“性善论”思想，强调人人都具有“天命之性”，具有“仁义礼智信”这些先天的道德品质，又从理论上指出了人人都有培养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这就为宋以后的封建教育重新树立了明确的方向，使那些暂时还不完全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人特别是青少年增强了信心。

从宇宙论到教育论，理学通过“人性论”把它打通了。上接天道，下连伦常，天人同理，天人相通，天人一贯。理学既不停留于先秦儒学那种缺乏理论的单调的道德伦理的说教，又扬弃了汉唐经学那种认为天可以直接干预人事的过时的神学目的论。理学不是那么露骨的人格化、简单化，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人性化、理性化，这使得理学教育理论更加精